

# 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同发展

## ——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札记

孙君明

### (一)

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都有过完全相同或非常近似的论述。这些论述,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概括地说,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对经济有依存作用;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且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列宁讲:“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71 页)人们的经济利益最终表现为政治,政治对经济还有统帅作用。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早已是我国学术界认同的普遍真理。如何看待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这需要从政治与经济以及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给予说明。

我国的改革同原苏联的所谓改革不同。我们从经济领域开始,首先在农村建立起家庭联产承包制,继而和城市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实行承包责任制。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进而扩展到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7 页。以下引文,凡出自同一卷的,只注页码。)众所周知,1978 年前,我国实行的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随即取得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并开始把经营与经济利益挂钩;扩大地方在计划、财政等方面的经济自主权;注意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的作用等等。实践证明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的道路。已为世人所关注。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 1977 年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讨论等等,都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步骤是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书记处和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因为它敏锐地涉及到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不以党代政,兼职和副职不宜过多以及如何接好班等重大问题。随后,修改了宪法,扩大了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规定国家领导人员实行任期制,对国务院机构与地方政府也作了不少改革,尤其在干部制度的改革方面,如废除事实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等等,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如同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一样,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是互相依赖,相互配合的。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孤立地进行的,也不是单刀直入地展开的。

### (二)

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什么作用呢?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整体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就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而言,至少有如下三个作用。

其一,先导作用。在当代政治的功能统率着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健康地发展,没有适当的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去推动是难以想象的。邓小平同志1985年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说:“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扬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它领域的改革。”(第116页)由于政治上发扬民主,改革和完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经济体制改革起了先导作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目的、任务以及全国推进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随后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既根本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又完全不同于原苏联的那种僵化的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它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改革深入到这一步,必然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先导。例如,企业就必须改革企业的领导体制,以推动企业各项改革的进行。

其二,适应作用。1986年4月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公民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它相适应。他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第176页)同年9月13日他听取中央财政领导小组汇报时又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第177页)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要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来适应经济的发展。”(第235页)这是因为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改革的推进和深化,需要建立在其上的政治上层建筑作出相应的调整。实际上,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这种深刻变化的本身,就具有伟大的政治变革的意义。许多事实表明,只从经济方面进行改革,有些事情就办不通,必须要有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适应,才能办好。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改革干部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克服各种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旧观念,诸如家长制、一言堂等级特权观念以及重人治等等。

其三,保障作用。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是经济改革的归宿和保证。一方面在改革中政治理论得到发展,才有可能提出搞市场经济问题,才有可能提出要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经济改革遇到难题,往往与党政机构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有关,存在许多矛盾,必须发挥政治优势,用政治来解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第164页)“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 (三)

我国的改革在农村改革成功之后就很快地转向城市。转向城市,实际上就是开展全面改革。这表明改革既有阶段,又有过程。经济体制改革有过程,政治体制改革也有过程。在阶段和过程中,出现某些先后现象本来是正常的事。事实上,正如前述,我国提出改革时机,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由于我国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必然随之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上述内涵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不是在总体上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发展过程和阶段中,某些方面都可能会有滞后,而不应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在整体上滞后,不加分析笼统地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种看法在舆论和实践上是有害的,因为第一,人民可能会低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第二,很可能会把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割裂开来,而把人们的兴奋点引向前者;第三,很可能会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过高过急的要求。

由于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自身的许多特点和规律,我们党和国家对政治体制改革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

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下列论述时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启示。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第252页)这就是说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其过程必然是渐进的,一般有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而且,在全部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因为目的正确就可以冒进。

第二,“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第240—241页)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是在现代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我们主张学习借鉴外国一切对我们有利的东西。而有些人,包括国际上某些势力总是希望中国走西方走过的道路,把西方的“民主”搬到中国来,还以此来判断我们的改革滞后与否,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总轨道上行进的。

第三,“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第220—221页)这就是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地前进,决不能一蹴而就。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要向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第179—180页)这三个目标是近期的,也是长期的,要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这些都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达到的目标。

第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第245页)这就是说,在我国法制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在人们对什么是民主的含义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的时候,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单纯地一味地强调民主。

第六,“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第285页)这就是说,改革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如果没有政治稳定,改革和发展完全是一句空话。

以上有关论述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和阶段性,尤其是强调了必须以稳定的政治环境作保证。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探索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它同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吻合的,带有明显的渐进性。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第176页)这是因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政治与经济又血肉相连,不能强行分割,人们常讲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中就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阶段的成就。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是必须协同发展的。